

在教育史脉络中重识汉诗的现代性

——评《20世纪以来的现代汉诗教育研究》

陈宗俊



《20世纪以来的现代汉诗教育研究》
黄晓东 著
安徽人民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

在现代汉诗研究的学术版图中，教育作为汉诗传播、经典化与价值建构的核心场域，长期以来缺乏系统性的历史梳理与深度剖析。黄晓东教授《20世纪以来的现代汉诗教育研究》一书的出版，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。该书以教材与课堂教学为核心，跨越百年历史维度，系统建构了现代汉诗教育的演变脉络，深刻揭示了教育场域中权力博弈与审美张力的互动机制，并对当下汉诗教育的困境与出路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反思。其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，更为汉诗教育的实践提供了理论参照，是一部兼具系统性、创新性与现实意义

的力作。

该书对现代汉诗教育史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，清晰呈现了汉诗教育从民国发轫到当代转型的完整轨迹。民国时期，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推进，汉诗教育开始摆脱传统诗词教育的桎梏，尝试将白话新诗纳入现代教育体系。朱自清、沈从文等学者的新文学讲义，不仅介绍新诗创作，更注重诗学理念的传播；民国教材如《国文百八课》选入胡适、徐志摩、闻一多等人的作品，体现了对新诗现代性的探索——胡适《尝试集》的入选标志着白话新诗合法性的初步确立，徐志摩《再别康桥》的入选则反映了对诗歌审美价值的关注。新时期以来，随着思想解放，汉诗教育逐渐回归审美本质，教材中开始选入朦胧诗（如舒婷《致橡树》、海子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）、被重新发掘的经典（如穆旦的《赞美》），大学语文教材更是迅速反映新诗研究的前沿成果，如选入王家新、于坚等人的作品。这种历史梳理并非简单的史料堆砌，而是将教育史置于社会文化变迁的背景下，揭示了汉诗教育与现代性进程的同构关系——民国的尝试对应着文化启蒙，新时期的审美回归对应着思想解放，展现了汉诗教育随时代演变的内在逻辑。

该书深刻揭示了汉诗教育场域中权力博弈与审美张力的复杂互动。教育作为文化权力的重要载体，其选篇与阐释始终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。民国时期，新文化运动形成的现代性意识形态主导了教材选篇，白话新诗的合法性得以确立；审美作为诗歌的本质属性，始终在权力缝隙中

寻求表达。该书通过大量案例分析了这种张力：如《再别康桥》从被批判到成为现代抒情经典的接受史，穆旦从被忽视到被塑造为经典诗人的过程，均体现了审美价值对权力话语的超越。穆旦的诗歌在解放后长期被忽视，新时期通过杜运燮、袁可嘉等人的发掘与阐释，其现代主义特质被认可，最终进入教材，成为经典；这一过程既体现了审美价值的回归，也反映了学术权力对经典建构的作用。此外，该书还探讨了教育中的经典化机制，指出经典并非天然形成，而是权力与审美的共同作用——海子的经典化既有其诗歌本身的艺术价值，也离不开西川等诗人的建构与传播；余光中《乡愁》的入选，既因其艺术感染力，也因其契合两岸统一的政治主题。这种分析突破了简单的二元对立，展现了汉诗教育中权力与审美相互交织、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。

该书对当下汉诗教育的困境与出路提出了富有现实意义的反思。随着新诗的发展，口语化写作成为潮流，但也出现了“口水诗”“梨花体”等争议，新诗的合法性面临挑战——2006年赵丽华诗歌事件、2010年车延高“羊羔体”事件，均反映了口语化写作与审美品质之间的矛盾。该书指出，新诗教育需要维持汉诗的现代性与合法性，既要吸纳新诗创作的前沿成果，也要注重诗歌的审美品质；同时，应加强新诗写作教学，让学生掌握诗歌创作的基本方法，避免口语化走向浅俗。书中引用民国时期孙良工的《新诗作法讲义》，强调写作教学对汉诗传播的重要性，呼吁当下教育重新重视新诗写作训练——民国教

材中曾有“仿做”环节，如朱翊新主编的《高小国语读本》要求学生仿造新诗，这种做法值得当下借鉴。此外，该书对经典化机制的分析也为当下汉诗教育提供了启示：经典的建构需要兼顾艺术价值与时代需求，既要发掘被忽视的优秀作品，也要避免过度政治化或市场化对经典的扭曲。该书对第八届鲁奖获奖诗集的分析，如刘笑伟《岁月青铜》的政治抒情、韩东《奇迹》的口语化探索、臧棣《诗歌植物学》的文体创新，展现了当下汉诗创作的多元面貌，也为教育选篇提供了参考——如何在多元中选择具有典范性的作品，平衡政治性与艺术性、传统与创新。这些反思不仅针对汉诗教育本身，更触及了现代汉诗发展的核心问题——如何在保持开放性的同时维持艺术品质，如何在时代变迁中传承汉诗的精神内核。

《20世纪以来的现代汉诗教育研究》一书以其系统性的历史梳理、深刻的机制分析与现实的反思启示，成为现代汉诗教育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。它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汉诗教育在现代性进程中的作用，更为当下汉诗教育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引。在汉诗面临诸多挑战的今天，该书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，值得教育工作者、文学研究者与诗歌爱好者深入阅读。它提醒我们，汉诗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，更是审美能力的培养与文化精神的传承——只有在教育中平衡权力与审美、传统与现代，汉诗才能在新时代焕发生机，继续书写其现代性的篇章。



提灯草虫，照见生命

徐琳

“三月，腐草为萤。火亮虫自然属于草虫了。但它又不是一般的草虫，是‘提灯’的草虫、诗意的草虫、乡愁的草虫。它不仅照亮自己，也照亮了别人。”这是《草虫在歌唱》里余老师在萤火晚会上的一段深情独白。

读罢许俊文先生的儿童小说《草虫在歌唱》时，总忍不住想起落云里的夏夜——该是满坡萤火吧？那些被余老师称作“提灯草虫”的火亮虫，不仅照亮了孩子们的眼睛，更把生命哲学的微光，洒进了每个读者心里。

这本写给孩子的小说，用最朴素的虫事，讲透了大人也未必懂的生命哲理。初读时，我和落云里的村民一样犯过嘀咕：虫教授不去帮着村民种猕猴桃、茶叶，却整天带着孩子们看松突圆蚧、找花角蚜小蜂，能有什么用？直到通过“以虫治虫”解了马尾松林的虫害，稀有天牛物种的发现引来多方关注，火亮虫繁殖基地成了乡村文旅的新盼头，才忽然明白：我们总用“有用没用”衡量生命，却忘了每只小虫都是生态网络里的重要一环——松突圆蚧看似是害虫，却养活了花角蚜小蜂；退

化了翅膀的天牛，恰是适应环境的智慧；就连蝉的一生，从钻地蛰伏到蜕壳高歌，再到殒命育后代，都是生命循环里最动人的篇章。

最触动心灵的，莫过于书中藏在虫事里的每一次联结。虫教授带着孩子们看花角蚜小蜂在松突圆蚧体内产卵时，孩子们惊呼的“寄生”，哪里只是昆虫的生存方式？那明明是整个自然的相处法则——没有哪种生命是孤岛，松突圆蚧危害马尾松林，花角蚜小蜂是松突圆蚧的天敌，虎头蜂却吃花角蚜小蜂……生生相克，彼此纠缠。就像余老师在《草虫之歌》里唱的：“草虫啾啾，我们和自然紧紧拥抱。”我们总说“生态保护”，可真正的保护，或许就是先学会看见这种联结：你踩死的一只蚂蚁，可能是某个蚁群的“觅食兵”；你赶走的一只萤火虫，或许正守护着一片草地的平衡。

还有融冰的故事，像极了我们每个人与自然的相处过程。起初他为没先发现松突圆蚧的“寄生”现象失落，满脑子是“我要第一个找到”的小虚荣；可跟着虫教授看久了虫，那份好胜心慢慢变成了对生命本身的敬畏——后来他发现稀有天牛时的雀跃，早不是为了“独占发现”，而是为“又多认识了一种生命”而欢喜。这份转变多珍贵啊，就像虫教授教给孩子们：当你放下“人类中心”的傲慢，试着用“昆虫之眼”看世界，反而能读懂更多生命的秘密。

合上书时，仿佛还能看见落云里的萤火在眼前闪烁。那些小小的火亮虫，哪里只是“诗意的草虫”“乡愁的草虫”？它们更像一个个温馨的提醒：当我们谈论生态危机、思考生命价值时，不必总说宏大的道理，而应先蹲下来，看看脚边的小虫——看它们如何生存，如何相处，如何在有限



《草虫在歌唱》
许俊文 著
海燕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

的生命里，活出属于自己的意义。

生命最本真的答案，从来不在远方的课堂里，就在落云里的草叶上，在那些“提灯”而行的虫儿身上。